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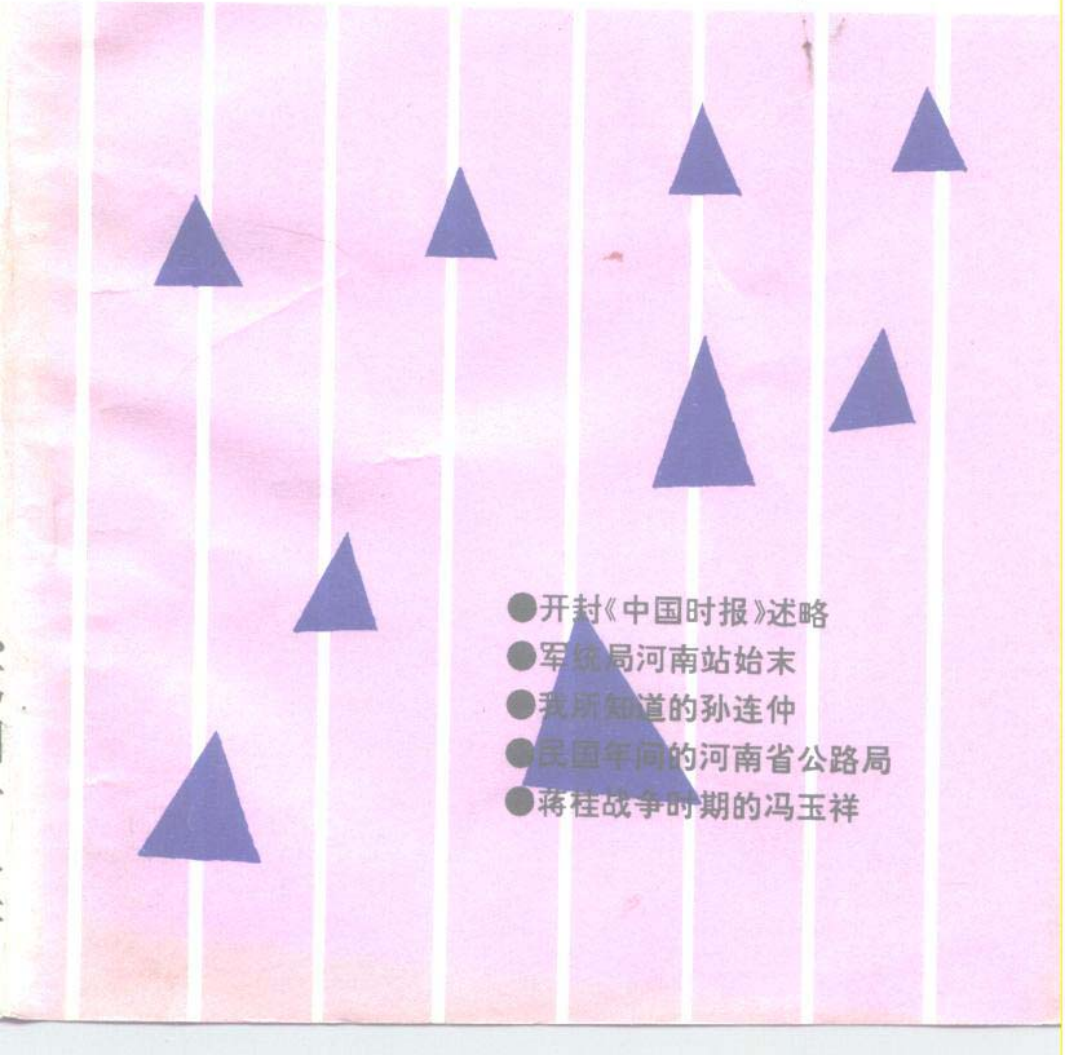
河南

1993

文史资料

4

(总第48辑)

- 
- 开封《中国时报》述略
 - 军统局河南站始末
 - 我所知道的孙连仲
 - 民国年间的河南省公路局
 - 蒋桂战争时期的冯玉祥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3 4

(总第 48 辑)

EA82/51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文化 天地	开封《中国时报》述略（上）	阎希同	4
	关于开封《力行日报》	老 曼	34
	忆《力行日报》	张黎至	42

军统局河南站始末	谢梅村	50
----------	-----	----

社 会 百 态	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	杨却俗	90
	关于《河南浩劫》的话	杨却俗	102
	故乡孟津杂忆	涂心园	109
	洛宁记事	周声远	120
	陕西宝鸡县禁烟被难记	水玉璞	128
校园 忆往	民国年间洛阳小学教育侧影	张玉麟	140
	南阳教育杂忆	王兵翔	14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中原人物	刘镇华在南阳	水普慈	154
	我所知道的孙连仲	宋聿修	160
	浪迹江湖话平生	杜畏之	180
	怀念挚友杜畏之	魏启民	192

民国年间的河南省公路局

王力仁 196

战争烟火	蒋桂战争时期的冯玉祥	黄建平	206
	孙传芳与冯玉祥的徐州之战	王茂亭	212
	重阳店痛歼日军战车记	张访朋	217

质疑·订正·补充

222

补

周恩来陪送杨虎城过郑州 (33) 高镇五智救薄一波 (101)

谢宝胜暴行二例 (139)

白

主编 吕 斌 副主编 魏一明 王锡朋 高蓉生

开封《中国时报》述略（上）

阎希同

从筹备到创刊——报道评论有声有色——蒋介石的
电令与郭海长启事——共产党的领导和成立董事会——
版面有了新的起色——同南阳《前锋报》出联合版——
报道再次出现高潮——“戡乱”令发布后的变故和人员
疏散——后期的报道——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开展活动
——停刊

1945年12月1日，一张站在人民立场说话的民间报纸——开封《中国时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它在初期，是由郭海长倡导、一些进步青年协同、又受到河南省地方实力派支持而创办起来的。创刊不久，郭海长同中共冀鲁豫区委城工部取得了联系，他被重新吸收入党，得到指示，要把报社作为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个据点，并明确了报纸的领导问题及办报的方针、任务、工作方法，经济上也得到中共的资助。从那时起，它已不是单纯的民间进步报纸了，它起的作用也不止表现在版面上。

随着内战的全面展开，《中国时报》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迫害所造成的重重困难，依靠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在河南国民党上层一些主持正义、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士的掩护和支持下，进行了艰苦复杂的斗争。

《中国时报》于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停刊，共存在

了两年半时间。这两年半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从创刊到1946年底，为《中国时报》单独出版；后期从1947年元旦起，同南阳《前锋报》出联合版，直到终刊。该报创刊初期，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离开后仍然和报社保持联系，对该报经历的艰苦曲折的斗争有所了解。为此翻检旧报，搜寻记忆，对该报的历史加以整理。一些曾在《中国时报》工作过的同志，也很关心此事，并热情地提供了许多情况和建议。但因时隔数十年，所记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尚望知情者补充、指正。

从筹备到创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在重庆复旦大学毕业的郭海长于9月份随其父郭仲隗（国民政府的豫鲁监察使）由西安回到开封。在西安时，他曾同河南大学教授关梦觉、河大同学梁建堂、报界友人赵宜人等，研究了办报的可能性，并嘱梁建堂先期回开封考察，一心要实现他多年的办报宿愿。

郭海长为河南新乡人，于抗战前在北平读高中时，受革命思想影响，曾加入中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新乡、焦作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40年10月在河南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共，因在校从事进步活动，被勒令退学。1941年9月他到重庆转学时，因河大中共组织已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转组织关系，他便根据中共南方局负责青年工作的刘光的指示，在学校广泛团结进步同学，开展革命活动。曾与中央大学的李毓英、朝阳学院的傅奎元（均河南籍学生）发起成立“学真学社”，以后扩大到有社会职业的人参加，与刘国明、姚雪垠、罗绳武酝酿成立了“民主生活励进会”。在这两个组织的成员

中也都酝酿过办报的事，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中国时报》的重要成员。

郭海长回到曾遭受日伪蹂躏多年的开封后，看到民众不仅生活困难，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更处于愚昧状态，当时已出版或正在筹办的几家报纸，几乎全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团、特等系统的，这使他更感到迫切需要创办一张能反映人民声音的报纸。

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须有一定的政治力量支持，在这方面，郭海长有其有利条件。他的父亲郭仲隗早年参加同盟会，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于右任、张钫等关系很深，当时任豫鲁监察使。且他与河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刘积学、郑州绥靖副主任张轸等关系密切，在省内党政斗争中处于某种超然地位，又有一定的影响。郭仲隗认为办报纸是一项启迪民智的社会事业，因此，欣然赞同并积极支持郭海长办报。于是，郭海长便和梁建堂一起，开始了办报的具体筹备工作。他们依靠郭仲隗的社会影响，在新乡商人中很快募集到一批资金，抓紧购买了开张所需的纸张等物品。社址问题也解决得很顺利，觅到市中心区北书店街6号一所比较理想的房院。印刷问题，议定先由建华印刷所承印。报纸申请登记工作短期内不能解决，经交涉，由国民党中宣部准予先行发行（申请登记于1947年5月才获准）。在此期间，郭海长还请韩吉门（名公佑，郭海长妻韩公超的堂兄）协助梁建堂做了许多工作。

在人员方面，他们邀请了一些河南大学、复旦大学的同学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办报。郭海长首先发电报邀请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学杨育智（现名何燕凌）、张增淮（现名宋琤）来参与筹办报纸。他二人与郭海长友谊甚笃，在重庆时，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从事青运工作，此时正滞留西安待命。他们接到电报后，认为在开封办一张报纸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工作据点，同时开封接近解

放区，是进出解放区的一个落脚地方。他们请示南方局，经王若飞批准，很快就先后来到开封。原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工作、拟去解放区的傅奎元（即傅伯龄）、王静娟，因情况变化，也应邀前来。先后被邀请来的还有武汉大学的汤家驹，西北师范学院的常精艺，河南大学的张绚、李叔英、徐邦敬、王绮云、李定中、阎希同等。这样，很快就聚集了大约 20 余人。杨育智不愧是个多面手，在报纸的筹备出版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参与报名的拟定，到报纸内容和版式的设计，甚至连报社门额上报名字体的放大，创刊号上广告的设计，什么需要干什么，而且都干得很好。

经过大家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一张对开四版的《中国时报》在开封创刊了。

创刊初期，人员是这样安排的：郭海长任发行人兼总经理（不称社长，意在区别于官报，但外人仍称他为郭社长），梁建堂任经理兼总编辑，下设编辑部和经理部。编辑部设编辑室、资料室、采访科。经理部下设总务科、业务科、工务科和会计室。张绚为编辑主任，杨育智为资料室主任，邵一鼎为采访主任。编辑、记者有傅奎元、王静娟、张增淮、汤家驹、常精艺、李叔英、李松灵、周中力等。兼任编辑有苏金伞、陈方堃、塞风（现名李根红）、李定中等。校对有马超然、李琇琦（即李流华）、许金台等。资料员有马超逸。总务科长是王石府，营业科长是杨克峻，工务科长是崔景富，会计主任是阎希同。编辑部这支队伍，年龄最大的是郭海长，也才 20 多岁，编辑部大多数人只 20 出头，未婚，无家室之累。他们思想进步，一般都是大学生，有的所学还是新闻专业，都有一定业务能力。报社因经费不足，只能供给工作人员质量很差的伙食，每月发很少的零用钱，但大家不计名利地位，不分昼夜地全身心为办好这张报纸而努力。

1946年春，人事上有些变化。崔进平从重庆回河南，担任了报社经理。张绚被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要去当助教，编辑主任由杨育智继任。同时，报社以其进步面貌不断吸引来一些同志，如陈承铮、韩光煜、石竹、李元绩等，担任编辑工作，郭海长的老友郭也生也来参加经理及编辑方面的工作。以后，杨育智又邀请黄志达来任编辑。当时，报社没有严格的人事制度和编制定额，一度人来人往，扰扰攘攘，由于人员多是朋友介绍来的，有的只是临时性质，来去自由。加上抗战胜利后，大后方人员大量向收复区流动，许多朋友路过开封，也有的是往解放区去或从解放区来，只要是倾向进步的，往往都到报社来往，报社不仅供给食宿，有的还尽可能资助路费，其中有些人也曾短时间参加编辑工作。

这支年轻的队伍，把《中国时报》办得很有特色，它内容丰富，编排新颖，一面世就引起众多读者的兴趣。创刊号第一版为广告和专栏，第二版为评论和国内新闻，第三版为国际及省、市地方新闻，第四版为副刊和广告。文字竖排。报头套红，“中国时报”四个字（横排）是请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写的，其下还标以英文名称“CHINA TIMES”。二版上部用四号字排的《发刊辞》，由河南大学进步教授嵇文甫撰写，全文如下：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和许多方面的赞助，本报今天开始和世人见面了。说几句开宗明义的话，我们这个报纸，除报道新闻、宣扬国策、传达民意，为每一报纸所应负的任务外，还要强调下列两点：

（一）扶持正义 一个社会的坏，莫过于是非混淆，邪正不分，莫过于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道不存，大家都失掉正义感，以致形成曾文正公所谓“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这样社会一切事业就算

完了。我们要重直道，要激浊扬清。宁为狂狷，不为乡愿。欲起顽立懦，振发一世之人心，非如此不可。

(二)倡导学风 昔原伯鲁不悦学，识者有以知周之将亡。“不悦学”三字，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评语。就豫论豫，我们能否逃脱这三个字的批评呢？在历史上，河南本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人才号称极盛。然而近代以来，步步落后。到现在，一提到河南的人才，实在太可怜了。我们认定有学术斯有人才。不揣绵薄，将尽力之所能，从各方面把研究学术的风气提倡起来。这在河南乃至新中国的建设上，不是无意义的吧？

略揭旨趣，请看今后之实践。

第三版除新闻外，刊登了曾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关梦觉的文章《论战后经济的发展》(分三次连载)。第四版副刊《山水间》载有陈康的《通经与通史》和禹鼎的《开封沦陷记》(连载)等。在第一版的广告栏中将太和大药房和长泰谦记造胰工厂两个广告横排并列，占两栏高的位置，并分别在两广告的上边和下边标以“消除人间病毒”、“洗净天下污垢”两行大字，语意双关，十分醒目，俨如两条标语。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曾说：“凭这两条广告，就可以知道是共产党的报了。”

报道评论有声有色

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新闻来源主要由国民党的通讯社中央社垄断。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既无法抄收，也不能公开采用。《中国时报》为了尽量突破中央社的新闻控制，削弱其恶劣影响，编辑人员花费心思，想了各种办法。一是选稿上对中央社电讯中造谣污蔑共产党解放区的消息尽可能不采用；对不得不采用的就在

标题上做文章。如电讯中称共军“滋扰”某地，标题则称某地区有“冲突”或“不太平”等。再是加强“本报消息”或选用、汇编其他报刊、通讯社的报道，或有选择地使用收听到的外国广播电台消息，力求多给读者透露一些真实情况。如创刊第四天曾以头条消息报道“张学诗部进入沈阳”，就是采用李琇琦所收的外电。有关本省本市的消息，主要由自己的记者采访。对本省各县、市，除派记者有重点地采访报道外，逐步发展了一批通讯员进行报道。1946年5月中旬，整编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孔从周率整编第五十五旅在河南巩县起义，《中国时报》独家巧妙透露了这一消息。用“本报讯”称：巩县来人谈，驻巩县国军某师之驻地巴沟、新沟、焦湾等村，日前连续发生密集枪声，周围由新来部队戒严云云。

《中国时报》不仅在创刊初期采用这些办法，以后也是尽可能这样做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又不得不作一些违心的报道。如报纸创刊的当天，就遇上了昆明“一二·一”惨案。报社同仁都是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的，但国民党当局不会允许在报上公开支持学潮，何况当时报纸申请登记还未批下来，经反复考虑，只好违心地按中央社的消息报道，12月3日此消息作的标题是：“藉口反内战闹学潮，昆明罢课已渐平息”。再者，当时郭仲隗希望新收复区的河南社会稳定，以利迅速发展经济，不赞同学生罢课。根据他的意见，报社又发了一个社论，题为《反对内战，反对盲动》，尽管肯定了学生反对内战的要求，但又批评学生罢课为盲动。报社内部对此意见纷纷，认为这样处理有损报纸形象。幸亏昆明学潮逐渐解决，报纸上再未出现指责学生运动的文字。

创刊初期，《中国时报》在地方、国内、国际方面的几项主要报道情况如下：

对河南省临时参议会的报道和评论 12月10日，河南省临

时参议会开幕。《中国时报》把这次会议作为重要的地方报道对待，除连续地及时报道会议的各项活动、重要讲话和政府各部门的报告外，还发表了“本报记者”的旁听记、闭幕记等。通过报道，大声疾呼反对贪污腐败，突出了会上提出的严办河南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及前河南第十行政区专员兼省粮食局长李杏村贪污案。从12月9日起到23日连续十几天，在第四版下面以近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重庆实验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李汉珍等舞弊案的起诉书和河南农工银行稽核王晓凡等关于此案的报告等重要材料。12月9日还配发社论《二李贪污案——不能不旧事重提》，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

关于此次会议，《中国时报》先后发表了五篇社论。会前12月7日发表社论《省临参会将开会》，希望各参议员能一秉正气，向政府多提意见，要求清理大贪污案，惩办发胜利财者，彻底查处汉奸等。会议开幕的当天发表社论《所望于临参会者》，鲜明地提出五点希望：一、民主之机构需要建树，民主之风气需要发扬；二、功罪需要辨明，忠奸需要分别，惩前所以毖后；激浊所以扬清；三、实事求是，不发虚言，言必有物，亦必求实行，决不丝毫放松；四、不合理之负担应即废除，奄奄一息之民命亟待救济，各项复员工作应加速进行，内战之现象应即制止，凡此种种皆应大声疾呼并督促实行；五、要求临参会“善尽示范作用”、“能代表最大限度民意”。

对政协会议的报道和评论 1946年1月10日，全国人民企盼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同一天国共双方下达了停战令。这是当时国内的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颁布停战令时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中国时报》的同仁们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十分振奋，对政协会议全力以

赴地进行报道。

政协会议前，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协议，1月6日的《中国时报》就作了突出报道，并发表社论《为苦难中人民庆幸》。其后，对政协会议的会前活动，也在头条位置以五栏大题作了报道（头条消息一般是四栏题）。1月10日政协会议开幕当天，以五栏题报道开幕消息，并发表社论《团结·和平》。1月11日报道开幕情况的消息，处理上也不一般：把头条六栏题的主题，用特大字标出“国共双方颁布命令，停止冲突恢复交通”，排成两行；把蒋介石宣布四项民主措施作为副题放在下面，内容是：“蒋主席宣布：政府决予人民以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各政党合法之平等及公开活动；实行自上而下之普选；释放政治犯。”当天还发表社论《我们赢得了和平》。这天第二版整版及第三版的一部分均为有关政协会议的报道。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月28日全文转载了上海《文汇报》1月24日所载《中共代表团十六日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这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中极为罕见。当郭海长带着这天的《中国时报》到新乡采访军调部新乡小组三方代表时，分送各代表每人一份，中共代表黄镇看后，特意与他紧紧握手。

政协会议于1月底闭幕，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中国时报》决定趁热打铁，大力宣传这个来之不易的重要文件。2月2日全文刊登《和平建国纲领》后，从2月8日起连续登出10篇社论。

政协开会期间，报纸还发了几篇社论。1月26日为支持重庆学生游行提出的“政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团结统一和平民主”等要求，发表社论《这也是我们的意见》。1月29日就政协会议专发社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月30日发表社论《从纸面到事实上》，要求蒋介石落实所宣布的四项民主措施。

正当大家为政协会议取得成功欢欣鼓舞的时候，发生了举世震惊的较场口事件。2月10日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人被特务殴打致伤。而中央社电讯却歪曲事实真相，说是“民众互相殴打”。当时在不得不用中央社消息的条件下，编辑人员作了如下的标题：“渝庆祝协商成功大会（引题）/惨遭暴徒捣乱（主题）/李公朴、郭沫若等多人受伤（副题）”，题上还加了眉题：“人间何世？”为使读者了解真相，编辑部抓紧从各方面收集材料，于2月16日编发了“本报综合报道”，题目是：《陪都庆祝协商成功大会流血惨案详情》，文中列举了《大公报》、合众社、联合社以及德里广播电台的报道，对事件发生经过提供了比较客观的与中央社报道不同的情况。所转述的《大公报》报道中，叙述了目睹惨剧的政协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张君勱、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张申府等不胜悲愤，要求处理惨剧善后且追究责任，并推周恩来、张君勱、李烛尘等往见蒋主席等。这篇综合报道最后还故意刊登了中央社为自己狡辩的声明，这就巧妙地揭露了中央社欺骗读者的嘴脸。在这期间，副刊上刊登了石敢当的文章《是何居心？》，对暴徒破坏政协庆祝会的罪行提出谴责和抗议，主张严加惩处；还转载了《大公报》2月11日所载冯至祥的诗《较场口》。

针对较场口事件，《中国时报》于2月18日、19日连续发表社论《保障“自由”，实现“民主”》，《迅即成立人权保障委员会河南分会》，指出和平建国纲领公布才短短半个月，“协商代表竟在堂堂陪都在会场惨遭横打，都门以外的小百姓更说不上保障了。”“我们不能只在口头上消极地说出老百姓的苦难，而应该积极地发动人民争取自由，争取民主！”

关于东北问题的报道和评论 东北问题是当时国内政治的热

点。政协会议闭幕不久，蒋介石就撕毁了政协决议，形势急剧逆转。较场口事件后，国民党当局又利用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煽动重庆及各大城市学生就东北苏军撤离问题举行反苏游行，并连续发生进步报纸被捣毁事件。《中国时报》注意到此时形势的变化，在报道方面较前谨慎。对中央社播发的学生反苏游行及各界人士对东北问题的表态稿，都予以刊登，但对有些明显的造谣稿，仍不选用。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东北问题的真实情况，于2月21日发社论《从云雾中看东北》，采取罗列各报论点及一些传说的办法，趁机将《新华日报》的观点也透露出去，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如“要求在东北、华北各地的外国驻军（意即不仅苏军还应包括美军——编者），都尽快撤离中国”、“中国所有的军队（意即不仅中共军队还应包括国民党军队——编者）都应该赶快依照协商的结果裁减整编”，“（东北）自治政府应不应存在要按民族主义原则来决定，或由民选决定”等。当局对此甚为恼火，对报社大加指责，对郭海长施加压力。《中国时报》被迫于24日又发一社论《反对东北特殊化》，降低了调子。3月1日在《两个问题》的社论中，对东北问题表示“赞同时下的一般主张”，“采取和平谈判的途径来解决”。3月3日又转载《太华报》的社论以应付，避免在自己的社论中说不愿说的话。

2月28日，《中国时报》用中央社伦敦合众电和路透社电所报道莫斯科电台广播内容。在二版头条位置以特大字五栏标题，报道东北苏军大部撤退，全部撤退决不迟于美军离华，并刊登苏军马林诺夫斯基总部对记者的声明，解释苏军延期撤退的原因。莫斯科电台称：“苏军经中国两度要求延期撤退后，自1月起恢复撤退工作，此后工作即继续逐渐进行中”，并对中美许多报刊上所载关于苏军延期撤出东北的各种歪曲真实情况的消息给予批驳，指

责中国境内大规模的反苏行为，“乃中国反动及反民主分子所制造，拟于苏军所解放之东北境内激起中国人民之反苏行为。”《中国时报》突出刊登了这条消息，使读者得以较全面地了解所谓东北问题的情况。

国际方面的报道和评论 《中国时报》每日在第三版上栏报道国际新闻，对重要问题及时发表社论，还配发有关的文章和资料，选发一些翻译文章。创刊的第三天，就发表社论《援助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以后对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联合国大会情况，均作连续报道并发表社论。1946年1月24日，就希腊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发表社论《从希腊内战说起》，表示反对干涉任何民族的独立解放，但又要反对任何形态的专制压迫。

从创刊到1946年2月，发表有关国际问题的来论、专论6篇，其中有关梦觉的《论战后经济的发展》、《原子弹时代的世界经济》，塞影的《由中美苏三国外交展望远东前途》等。1946年1至2月刊登13篇翻译文章，其中有美国新闻处特译稿《印度问题内幕》，钟远蕃译《从经济上看英国殖民地的压榨政策》，以及平野正男的《从日本议会看币原内阁》等。刊载这样多的关于国际问题的专文、译文，在当时开封各报中是较突出的。

专文、专栏、副刊、资料 报社广泛联系河南大学的教授及各地学生，约请他们撰写了很多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经常以“专论”、“来论”、“星期专论”等形式发表；或者设专栏定期刊出。还有选择地刊登一些翻译文章，提高读者的知识水平。在初创刊的三个月内，发表有关国内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专文10篇，有关梦觉的《经济建设与经济复员》，千家驹的《战后法币整理问题》，孙重农的《基层经济建设与合作事业》，汪以洋的《黄金、外汇、物价、政治》，黄立文的《黄金和美钞的世界》，陈仲凡的《如何培养国民新道德》，

任访秋的《学风与世风》等。有时也转载或摘登其他报刊的进步文章，如马寅初关于中国战后经济建设的文章等。

专栏主要有以下几种：1、“河南史料”。从创刊到1946年3月1日，共发25期，史料70多篇，主要是清末至民国初期河南省政治、军事、教育、新闻等方面的史料，由资料室编辑。2、“经济谈丛”。1946年1月创刊到4月底止，共发21期，有30多篇文章。内有钦本立的《军费庞大伤害了国民经济》，伍启元的《民主经济和经济民主》，马寅初的《外汇政策》，转载《商务日报》的社论《打倒官僚资本》。此专栏由杨育智与李定中负责编辑。3、“学术讲座”。1945年12月9日至次年1月份，在第一版下面与“河南史料”轮换刊出，曾发表王毅斋的《科学的意义与发展》、《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等。2月份以后停刊，学术文章散发在第二、三版上。

副刊是《中国时报》着力经营的一块阵地。创刊初期有《山水间》（综合副刊）、《桥》（文艺副刊）、《学习》、《四海之内》（国际副刊）4种。1946年1月中旬，《四海之内》暂停，增加了《文学窗》。《山水间》、《桥》由王静娟负责，杨育智也参加编辑。《山水间》每周3期，共出45期，曾刊登嵇文甫的《学术中国化》及《新说书》15篇。《新说书》借古谈今，推陈出新，对人很有启发。还有伯赞的《贪污列传序》，它尖锐指出：“贪污虽为中国历史传统，但从没有象今日这样猖獗、普遍和公然横行。抗战以前无论矣，自抗战以来，中国贪官污吏，风起云涌，盈天下皆是也。”也刊登译文，如苏儒翻译的《狄托！南斯拉夫人民的领袖》等。《山水间》还设有“水声”、“碎石与浪花”等小栏目，常以三言两语批评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桥》每周两期，共出18期，曾连载丹青的《周豫才及其艺术的现实主义》、《周豫才思想发展道路